

基于叙事学的佛经与道教《灵宝经》的对比研究

——以叙述者为中心^{*}

王皓月^①

内容提要：20世纪60年代以来，叙事学理论迅速发展，现已成为文学研究的主流方法论之一。

虽然叙事学的研究对象基本为小说，但是佛教经典和道教《灵宝经》也属于叙事文的范畴。所以，本文希望借助叙事学的研究方法，围绕人称、叙述者与故事的关系、叙述者的作用、视点等问题，对比研究佛经与道教《灵宝经》中叙述者的不同，揭示《灵宝经》在创作手法上的特点。

关键词：叙事学 道教文学 佛教文学 灵宝经

作者简介：王皓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编审。

一、序言

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刘宋道士陆修静编纂的《灵宝经目》被发现，关于道教《灵宝经》的成书等问题出现了大量研究。但是，对于作为文学作品的《灵宝经》，人们的认识不够深入。因此本文想借叙事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对《灵宝经》中叙述者的研究揭示《灵宝经》在创作手法上的特点，及采用这种手法的目的。

“叙事学”（法文 *narratologie*，英文 *narratology*）这个概念最早是托多洛夫在1969年发表的《〈十日谈〉语法》中提出的，自出现以来很快成为了文学理论界关注的焦点，先后出现了托多洛夫、热奈特、罗兰·巴特、格雷玛斯、布雷蒙等代表性人物，并且提出了大量的用于文本分析的新理论。关于叙事学的定义有不同的说法，但是共通的一点就是认为叙事学是研究叙事文的理论，主要的分析对象包括小说、民间故事等。虽然佛经和道教《灵宝经》并不是叙事学研究者建立理论时所预想的分析对象，但是总地来看二者也属于叙事文，且已经不乏运用叙事学理论方法对佛经进行分析的研究^①，所以我們也可以用叙事学理论展开对道教经典的分析。

一般认为，《灵宝经》的编纂明显受到了佛教经典的影响，而在过去的《灵宝经》与佛经的对比研究之中，人们主要关注的是二者在思想上的共通之处，而通过叙事学的方法，我们可以发现《灵宝经》和佛经在写作手法上有很大的不同，这也让《灵宝经》在借鉴佛经的同时拥有了自己的文学特色。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佛经的概念比较宽泛，而且随着集结时期和汉译本的不同，叙事手法也不一样，无法全部进行对比研究，我们需要找出一个具代表性且有别于道经的佛经叙事模型。因此，本文限定作为研究对象的佛经为记载阿难等人以第一人称内聚焦形式回忆佛陀宣教过程的经典，同时将其作为讨论佛经叙事的基本形式。

二、人称

一般作者在创作故事时都会面临人称的选择，即采取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第一人称给读者的印象是叙述者在讲自己的故事，而第三人称给读者的印象是叙述者在讲别人的故事。从本质上说，叙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六朝道教变革史考”（批准号：17CZJ016）的阶段性成果。

^① 吴海勇：《中古汉译佛经叙事文学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孙鸿亮：《佛经叙事文学与唐代小说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述者是否作为故事中的人物登场是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区别所在。^①

在人称方面,《灵宝经》与佛经有所不同,《灵宝经》采取的是第三人称,而佛经普遍采用了第一人称。顺便说明,中国古代的经典之中,第三人称占有绝大多数的比例,而第一人称相对少见,作为叙事作品典型的《庄子》也是第三人称的作品。那么,为何佛经采取了第一人称,而《灵宝经》却没有像佛经一样采用第一人称呢?

在印度文明之中,人们崇尚口口相传而轻视文本,早期佛教文献的传播方式也是口述,一开始内容并不固定,但战争和饥荒让诵经的僧人数量大减,为了不让佛陀的说教失传,不得不其以书面形式集结保存。^② 这些从印度传来的佛经很多采用了第一人称,这由开篇的“如是我闻”就可以明确。当然,也有部分佛教没有使用“如是我闻”四字开篇,如西晋竺法护译《生经》等仅写“闻如是”的经典,另外还有《六度集经》等直接进入叙事的经典。但总体而言,开篇的“如是我闻”四字确是佛经的特色。

相传释迦牟尼在涅槃之前嘱咐有四事,其中之一就是集结的经文要以“如是我闻”开篇,以区别外道的经典。因为佛经是由佛入灭后,最早由十大弟子中以“多闻第一”著称的阿难編集,最初的佛经《长阿含经》《中阿含经》《杂阿含经》《增一阿含经》《譬喻经》《法句经》等,都是阿难依靠自己的记忆背诵出来的。所谓“如是我闻”,是指佛的弟子阿难说自己听到经中的佛说就是以下内容。可以说,佛经就是阿难以第一人称记述自己听到的佛的教导。当然,在“如是我闻”之后,阿难在佛经之中没有继续使用“我”,而是使用自己的名字“阿难”。因为经典的叙述者阿难无疑是作为佛经中的登场人物出现的,而叙述者是否作为故事中的登场人物出现,是第一人称叙事和第三人称叙事的本质区别,所以这些佛经属于第一人称的叙事,不仅仅是因为开头出现了“如是我闻”。

佛经的序分之中,一般有六成就为证信,即一信、二闻、三时、四主、五处、六众,而道教《灵宝经》最多有四事,少了最初一信的“如是”和二闻的“我闻”。《灵宝经》在模仿佛经的同时,却放弃了佛经的第一人称的手法。而这个变化的背后有深刻的理由,并非是刻意淡化道经的佛教色彩而已。

佛经是佛的弟子阿难整理的,也就是说是由“我”(阿难)写出的。如果《灵宝经》采取第一人称,就必须说明“我”是谁,而从《灵宝经》的教理之中无法找出一个与佛弟子阿难相对应的人物来充当“我”。尽管在《灵宝经》中也常能看到第一人称“我”,但是,“我”都不是叙述者的人称,而是故事中人物的自称,或者进行仪式的人进行上陈或者念咒时的自称。

从《灵宝经》内容来看,也无法推断经典的叙述者是谁,或者说《灵宝经》中登场人物之中没有人物适合充当叙述者。元始系《灵宝经》的中心人物是元始天尊,主要人物包括太上道君、上智童子、飞天神人等,次要人物包括诸天真等,其中没有哪个神格在每部经典之中出现,所以没有固定的人物充当统一的叙述者。例如,在《太上洞玄灵宝智慧定志通微经》之中,在左、右玄二真人登场之前,单独对天尊进行了描写,这说明叙述者显然不是之后登场的左、右玄二真人,且除了天尊和左、右玄二真人之外,经典前面的叙事没有其他人物,所以叙述者没有作为人物登场。还有,仙公系《灵宝经》的《太极左仙公请问经》^③,其内容是记述的葛仙公向高上老子请教的过程,除了这两个人物之外故事之中几乎没有其他人物,只有葛仙公有可能当叙述者,但此经并没有标明他就是撰者。

那么,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不同是否会让人感觉《灵宝经》的内容客观性较强而佛经带有更多主观色彩呢?实际上,用第一人称“我”不意味着叙述的内容缺乏客观性。如果第一人称的“我”仅仅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在叙述之中没有掺入个人的感情和心理活动,该第一人称的作品反而是客观性比较强的作品。虽然佛经以“如是我闻”开篇,但在佛经的集结的过程之中,有大迦叶尊者及五百位

① [法]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71—178页。

② 纪贇:《早期佛教之口传文献研究》,陈允吉主编:《佛经文学研究论集(续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③ 关于该经典的基本问题,参见王承文:《敦煌本〈太极左仙公请问经〉考论》,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三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



大比丘等众多可以判断其内容真伪的人，所以佛经一方面是阿难的“我闻”，一方面也具有高度的客观性。所以，可以说《灵宝经》和佛经在人称上的不同并不会对二者内容的客观性带来影响。

三、叙述者与故事的关系

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叙述者不等同于作者，叙述者是指叙事文之中叙述的主体。东晋末期的葛巢甫、刘宋初期的陆修静等多人参与了元始系《灵宝经》内容的编纂，但其叙述的内容发生在传说中“五劫”之一的上皇时期，所以其叙述者不可能是东晋末、刘宋初的人。相比之下，很多佛经是阿难记录的自己所闻佛的教说，所以叙述者与作者一致。

无论是作为故事中的人物出现，还是不作为人物出现，任何叙述都必然有叙述者，否则故事不会被表述出来。而根据叙述者与故事的关系，有同故事和异故事的区别，同故事之中，叙述者作为故事中的人物出现，而异故事的叙述者不作为故事中的人物出现。前面所说的以第三人称写成的《灵宝经》就是异故事，而以第一人称写成的佛经则是同故事。

异故事的情况，叙述者不作为故事中的人物出现，则会有较大的叙述自由，可以采取全知视角，但也可以出于减少信息的目的，仅仅透露有限的内容，不披露人物的内心情感和行为动机。而同故事的叙述者则多了很多限制，他必须处理自己与故事的关系，也就是说他在故事中的见闻和参与。

同故事的叙述者作为故事的人物，既可以是主人公，也可以是次要人物。以次要人物作为叙述者，首先可以增加故事的客观性，并且可以增加主人公的神秘感，因为主人公的地位和能力一般比次要人物高，所以读者可以按照叙述者的叙述仰视主人公，有利于主人公形象的塑造。

佛经之中佛是中心人物，每部佛经的传教的内容不同，出现的人物也有所不同，但阿难作为佛的十大弟子之一，伴随在佛的身边记录佛的教说，所以可以认为其是主要人物之一。有的佛经之中，阿难不仅是记录的角色，而且还是故事的中心。如《楞严经》之中，阿难坦白自己的堕落，向佛请教修定的方法，于是佛告知了破魔的方法。因此，佛经的叙述者往往是佛经的主要人物之一。

四、叙述者的作用

《灵宝经》的叙述者如果不参与故事的叙述者，那其具体作用是什么呢？根据《灵宝经》的内容，我们发现叙述者在其中主要有叙述功能、解说功能、组织功能等三个功能。

首先，关于叙述功能。元始系《灵宝经》记录的就是元始天尊宣教的过程，特别是在开篇的序分部分，叙事色彩比较重。例如《明真科》的开篇写上智童子向元始天尊请问禁戒明真科律，为来生人世作善因缘，度脱三涂，上升天堂。天尊于是命十方飞天神人，出明真科律，以度童子。这部分内容就是叙述元始天尊向上智童子传授《明真科》的缘起。

其次，一般《灵宝经》之中有很多解说性的内容。例如，《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真文天书经》之中，叙述者关于《灵宝五篇真文》进行了解说，详细叙述了《灵宝五篇真文》出现的经过，可以认为是叙事文，但是在《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真文天书经》之中，其并非是叙述者记述他所看到的发生的情况，而是以序的形式对《灵宝五篇真文》进行解说，真正的故事是从太上道君向元始天尊请教《灵宝五篇真文》开始。这部分内容并非以下故事中元始天尊所说，也不是太上道君或其他神格所说，所以应该就是叙述者的解说。

关于第三个的组织的功能，还是以《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真文天书经》为例。其中开篇至元始天尊传教的部分为解说，然后是叙述太上道君向元始天尊请求出示《灵宝五篇真文》的经过，再之后又是转载天上紫微宫元始旧经的内容。《灵宝经》的叙述者不是直接记述元始天尊的教说，而是叙述者自己把藏于天上界紫微宫的元始旧经的内容进行了披露，这部分内容既包括《灵宝五篇真文》这样的天书，又包括了“智慧上品大诫”等诫律，甚至还有天上灵宝斋法的仪式。按照《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真文天书经》的说法，元始天尊并没有将《灵宝五篇真文》的内容直接给太上道君，而是让太上道君自己去



看。但是,《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真文天书经》却在随后记载了《灵宝五篇真文》的内容。也就是说,是叙述者披露了其内容,而不是叙述者记录元始天尊向太上道君披露的内容。从这个经典内容的安排,可以认为叙述者还具有组织作品功能。

佛经叙述者的功能与《灵宝经》的叙述者功能相比有所异同。相同的是,佛经的叙述者阿难也具有叙述和组织的功能,不同的是阿难具有证明的功能,不具备解说的功能。阿难具有证明功能,因为他就是以见证者身份记录佛陀的说教,佛经开篇的“如是我闻”,就是阿难强调自己作为叙述者,叙述的内容是自己真实见闻的。同时,因为阿难在讲说佛经的时候,并没有成佛,所以其不能说完全理解了佛陀的教说的内容,仅仅是依靠自己记忆来重现当时的场面,没有对佛陀教说的内容添加自己的解说。所以,在叙述者的功能方面,《灵宝经》与佛经有重要的区别。

五、视点

在叙事之中除了叙述者,还有视点的问题。而由于视点含义较为模糊,现在一般以热奈特所创造的聚焦概念对视点进行分类。叙事学普遍采用的视点的类型有以下三种:第一,非聚焦,叙述者大于故事中人物;第二,内聚焦,叙述者约等于故事中人物,不比故事人物知道的更多;第三,外聚焦,叙述者小于故事中人物,知道的更少。^①

非聚焦不是以故事中的人物的视角,而是以一种俯瞰视点进行叙述,叙述者具有全知视点的特点,对整个故事的经过和人物的命运早已预知。一般情况下,内容复杂、人物众多的小说经常采用非聚焦的视角,例如《红楼梦》《三国演义》等。

内聚焦则是按照人物的感官得到的信息进行叙述,即叙述者放弃自己的外部眼光,转而使用故事内部人物的眼光来观察。其优势是可以表现人物内心的丰富的活动,但缺点是观察者只能了解到自己观察到的事情。佛经开头的“如是我闻”表明,其内容采用了阿难的内聚焦。佛经之所以采用内聚焦,不是想表现阿难的内心活动,而是提醒佛经的内容是阿难所见闻的,也是被“我”所局限的。

内聚焦又分为三个亚类型,固定内聚焦、不固定内聚焦和多重内聚焦。佛经属于固定内聚焦。固定式内聚焦就是叙述者完全用一个聚焦人物的眼光来替代自己的眼光,所了解到的内容与信息与该聚焦人物所看到的一致。按照这样的观点,很多佛经应当属于较为典型的第一人称固定式内聚焦叙述。阿难仅仅记录在佛身边的所闻所见,不会进入佛或者向佛求教者的心理世界。佛经之中,经常以“心作是念”来描述人物的心理活动,但是这种情况下,人物基本都会在随后告诉佛自己的心理活动。也就是说,人物的心理活动是基于人物的自白,而不是说阿难可以掌握任何人物的内心活动,具备全知视角。甚至阿难在描述自己的心理活动的时候,也要在随后向佛告诉自己心中的想法。如《中阿含经》卷二十四《中阿含因品大因经第一》之中先说“尔时,尊者阿难闲居独处,宴坐思惟,心作是念:‘此缘起甚奇,极甚深,明亦甚深,然我观见至浅至浅’”,之后接着说阿难从宴坐起,往诣佛所,对佛坦白自己刚才那句“心作是念”的内容。

此外,佛经之中也有关于人物做梦的内容。《金光明最胜王经》的《梦见金鼓忏悔品第四》之中,妙幢菩萨做大金鼓梦,但通过后面说第二天他在佛和阿难面前讲述了他的梦,而阿难只是转述了他听到的那个人的说法而已,正所谓“如是我闻”,不代表叙述者的阿难能随便进入佛经中人物的思想活动。而且,佛经中佛或其他人物有知晓过去未来之力,容易让人误以为是全知视角。实则不然。理由是,只要是人物说出来的,都是作为对话被记录,并非因为叙事者有全知视角,可以知晓过去未来。常见的误解是,基于佛经登场人物谈话的内容穿越时空,就认定其是全知视角,这是因为没有准确理解叙述者全知视角的准确含义。所以,此类佛经不是以全知视角创作的。当然,经典在流传和翻译过程之中难免有内容变动,有时也会发生视角变化,第一人称内聚焦是佛经最基本的视角。

外聚焦之中,叙述者从外部提供人物的行为、环境、形象、表情、言论,而不揭示人物的内心情

^① 胡亚敏:《叙事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36页。



感和行为动机。例如《灵宝经》的《太上洞玄灵宝空洞灵章经》^① 开篇就有典型场面式描写，没有明确交待元始天尊和太上道君等人物心理活动，叙述者似乎就是在一个观察者的位置，仅仅描述人物欣喜之状。因为外聚焦叙事文缺乏对人物内心的描写，所以其人物往往比较神秘。并且，《灵宝经》的叙述者也没有以某一个故事中人物的视角去进行叙述，完全没有叙述者自己的感受和评价，所以也不是内聚焦。因此，我们应该将《灵宝经》的视角归为外聚焦。

虽然《灵宝经》的叙述者在多数时候表现为外聚焦，但有些地方使用了非聚焦，对经典中的相关的内容进行解说。在解说之中，叙述者所知道的内容似乎不是元始天尊或者其他人物告诉他的，而是他以全知视角进行的解说。例如《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真文天书经》的一开始，有大段关于《灵宝五篇真文》由来的解说，这时候叙述者就采取了非聚焦的视角，而不是以故事中人物的视角的内聚焦或者观察者的外聚焦。

因此，《灵宝经》的视角比较复杂，可以说是外聚焦与非聚焦的结合。在叙事学上，这种情况属于视角的变异。而对视角进行变换，主要有减少信息和增加信息这两种效果，减少信息制造神秘，增加信息容易理解。但无论是减少信息还是增加信息，都要保持一个度，神秘感太强，则会变成无法理解，太简单明白，则又无法让人产生好奇心。外聚焦与非聚焦的结合使用，一方面保持了与元始天尊等神格的距离，制造了神秘感，另一方面又补充说明了故事中缺乏说明，但对理解故事很重要的背景信息，如《灵宝五篇真文》的形成过程等。如果轻易使用非聚焦的手法，对元始天尊等神格的内心活动进行描写，则会造成叙述者凌驾于元始天尊等神格之上的印象，这对于塑造神秘的神而言无疑是不合适的。如果都使用外聚焦，叙述者仅仅把作为观察者看到的内容告诉读者，则让人无法理解其整个事件的背景，如果尝试把《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真文天书经》一开始的关于《灵宝五篇真文》成书过程的说明去掉，直接以太上道君向元始天尊请教《灵宝五篇真文》开始，之后的对话之中又没有出现相关的解说，则会严重影响对《灵宝五篇真文》的理解。

六、外叙述者与内叙述者

叙事文之中往往有不同的层次。外部层次又称为第一层次，指代包容整个作品的故事，内部层次又称第二层次，为故事中的故事，指代故事人物讲述的故事、回忆、梦境等，与之相对应的，外部层次的叙述者为外叙述者，内部层次的叙述者为内叙述者。

外叙述者可以在故事中起支配作用，也可能仅仅起组织内容的作用。《灵宝经》之中，外叙述者是没有现身的，而故事之中的元始天尊讲故事之时，元始天尊成为内叙述者。例如《太上洞玄灵宝智慧罪根上品大戒经》之中，元始天尊向太上道君讲述自己在龙汉、延康、赤明、开皇、上皇五劫之中出世度人的经历，这种情况下元始天尊就是内叙述者。

外叙述者和内叙述者之间可能是一种因果联系，对于通过内叙述者讲自己的回忆，说明现在发生的事情的原因。《灵宝经》中典型的的就是有关宿命因缘的部分。如《太上洞玄灵宝智慧定志通微经》之中，元始天尊就对二真人讲了名为乐净信的财主和家人的故事，在讲完故事之后，元始天尊开示因缘，原来元始天尊曾是乐净信，二真人就是故事中的法解夫妇。因为三世都奉道的情况比较少见，所以元始天尊特意说此因缘。

《灵宝经》之中外叙述者和内叙述者的存在，让《灵宝经》具有明显的镶嵌结构。《灵宝经》使用镶嵌式结构，具有以下意义。

第一，满足了塑造人物形象的需要。《灵宝经》在叙事之中，是以第三人称外聚焦的视角写成的，其叙述者作为不参与剧情的观察者出现，所以叙述者无法直接对人物的历史进行充分的介绍，只能借助内叙述者之口对人物的历史进行说明。在文学之中，戏剧剧本经常需要让人物在剧中讲述自己的经

^① 现《道藏》之中没有收录该经典，谢世维对其成书和内容有深入研究。谢世维：《天界之文——魏晋南北朝灵宝经典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13—252页。





历,这是因为,剧本在创作时也是用第三人称外聚焦的手法来进行叙述,最终在舞台上呈现时,观众只能看到舞台上呈现的人物的动作和台词,不仅无法直接看到人物的内心,也不了解人物的经历。所以为了克服这种缺陷,戏剧经常让人物充当内叙述者,即让人物讲故事,告诉观众自己过去的经历。同样在叙事之中,采取第三人称外聚焦的《灵宝经》对内叙述者的利用,也是为了塑造完整的人物形象。如上面《太上洞玄灵宝智慧定志通微经》元始天尊讲的故事,就说明了元始系《灵宝经》主人公元始天尊的因缘,而《太上洞玄灵宝诸天灵书度命妙经》之中,元始天尊也论述了自己在不同劫运出世度人的历史。这样就让元始天尊的形象更加具体,真正成为一个人物,而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因为故事中的角色只有具备经历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物,而不是符号型人物或功能型人物。

第二,起到了丰富情节的作用。《灵宝经》的叙述者观察到的故事一般都是元始天尊传教,故事的情节比较简单,而且人物的关系也比较固定,整个故事发生的时间也比较有限。如果整部《灵宝经》都是这种内容构成,则其情节很难能吸引人。情节是否足够复杂新颖,是一般对文学作品进行判断的重要标准,简单而重复的情节不会受到好评。所以,内叙述者可以自由地叙述事件跨度大、内容新奇的故事。如《太上诸天灵书度命妙经》之中,元始天尊向苍帝君、赤帝君、白帝君、黑帝君、讲述龙汉之年出于此五方,当时与高上大圣玉帝撰十部妙经出法度人,令五方世界多有不死极乐之人。元始天尊讲述的故事时间上溯至龙汉,而地点跨越五方无极世界,拓展了《灵宝经》的时空背景。

第三,突出强化了说教的效果。《灵宝经》中内叙述者所讲述的故事,都是以证明因果报应为中心,通过事例进行说教,将原来抽象的道理具体化。信道为善的升天成仙,不信道作恶的在地狱受苦。但仅仅重复这个道理是单薄的,只能说是一个观点,如果借助事例,则更加具有说服力,相当于用事实证明了这个观点。如《太上洞玄灵宝真文度人本行妙经》^①之中,太上道君就讲述了阿丘会的因缘。《太上洞玄灵宝赤书玉诀妙经》卷下之中,关于该经典的缘起,说太上道君命赤帝灵童,出灵宝赤书玉诀二卷给南极尊神,命其传给丘曾阿。丘曾阿之所以能得到《玉诀妙经》,通过《太上洞玄灵宝真文度人本行妙经》论述的他的因缘就能明白。

在佛经之中,除了作为外叙述者的阿难,故事中的登场人物也常常充当内叙述者,特别是向佛陀求助之时,经常讲述自己的经历或者梦境等。比较特殊的是,作为外叙述者的阿难,有时也充当内叙述者。东晋的瞿昙僧伽提婆译《中阿含经》卷八《未曾有法品·未曾有法经第一》之中,阿难就叙述了世尊迦叶佛的诞生以及修行的经历。这种外叙述者充当内叙述者的情况,是《灵宝经》所没有的。

七、结语

虽然叙事学迄今依然缺乏统一的理论,但叙事学在文学理论领域已经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其分析方法也已经基本成熟。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完全被叙事学的一家之言所束缚,而是综合叙事学中公认的基本方法对《灵宝经》进行分析,因为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证明某一个叙事学理论的优越性,而是解明《灵宝经》的叙事的特点,尤其是在借鉴佛经叙事风格的同时又有哪些区别,既有助于关于道经成书和思想的研究,也可以为叙事学理论提供新的分析素材。

(责任编辑 周广荣)

^①《正统道藏》没有收录《太上洞玄灵宝真文度人本行妙经》,但可以通过敦煌资料 P.3022V 复原其大部分内容。